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推进理论创新

曹文泽

核心阅读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首先要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以大历史观来看,今天的中国是从数千年历史中走来的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正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一伟大文明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是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方法,只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中,才能不断化抽象为具体,进而实现创新发展。一百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指导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仅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文化沃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为我们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实现创造性转化、使之焕发新的时代光彩;要根据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实现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通,并将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创新理论具有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只有植根历史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反映中华民族精神风貌和优秀特质的灿烂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坚持植根历史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食古不化”,简单复兴传统文化,更不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替代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围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方法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来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启示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关键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要在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的基础上,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坚持推进“第二个结合”。具体而言,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实现创造性转化,使之焕发新的时代光彩;要根据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实现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通,并将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创新理论具有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

坚持全面挖掘、深层注入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坚持植根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坚守文化根脉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必须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全面挖掘、深层注入,从而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等,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特别是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系统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从而更好掌握推进理论创新的主动,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

全面挖掘是为了更好实现深层注入。我们党历来重视探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推动形成深入人心的创新理论。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借用《诗经》中的“小康”一词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运用人民群众易于接受、通俗易懂的中国话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学理哲理,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中国形式”,更具有“中国内涵”,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比如,以《韩非子》中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生动说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推动“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在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牢牢扎根。新征程上,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要在形式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表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内容层面,在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上下更大功夫,不断推进“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历史进程,从而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来源:《人民日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道

刘余莉

在《论语》的开篇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以“学”字作为整部《论语》的领起,可谓意味深远,说明学是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关键。古人所学乃圣贤之道,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尊师则无法超凡入圣,修齐治平亦沦于空谈。故《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敬学对于明德、传道、治国、平天下皆至关重要。

尊师与明德

纵观当今之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大多身心不安。究其原因,实与不学圣贤教诲而迷失本性密切相关。正如孟子所言:“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礼记》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可见,古人所学者,道也;目的是明明德,成就圣贤。

《说文解字》谓:学,觉悟也,本作“斆”,篆作“学”。即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也。可见,师,先觉者也;弟子,后觉者也。弟子拜师,以求觉悟也,而觉悟是性本自善,必从真诚恭敬心中求得,因此师与弟子当两俱真诚,师当如师,弟子当如弟子。尊师最重要的就是依教奉行,具体讲就是做到“知行合一”,用真诚恭敬之心去学习、落实老师的教诲。

在社会污染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更要懂得亲师择友,即亲近贤德的老师,选择善友。荀子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智,必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人虽然禀性质朴、美善,心智聪慧,但必须求贤师学习,选择贤友交往。如果遇到真正贤明的老师,并向他学习,那么每天所听到的都是尧、舜、禹、汤这些古圣先王的大道;如果得到善良的朋友并且与他交往,那么所见到的都是忠诚信实、恭敬礼让的品行。每天进修仁义不断进步,却不知不觉,这是潜移默化。反之,如果结交的都是不善之人,所听的都是欺骗、巧诈、虚伪的言行,所看的都是邪污卑下、放荡邪曲、贪图利益的行为,则将会使自己遭受刑罚杀戮还不知不觉,这也是潜移默化的结果。

古人还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润。”亲近善良有德行的师友,就像在雾水、露水中行走,虽然打湿了衣服,但能时时蒙受其德风的滋润,自然能“德日进,过日少”,使自己也熏修成为有德之人。

尊师与传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即圣贤相传之道。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师道首先以尊严,是因为真正的明师皆不标榜自己,而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传承古圣先贤道脉的传道者。这种无我的精神,正是为师者所以光载千秋、万众敬仰之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最受世人尊敬。因为医生救人身命,不言财利;老师成就慧命,使人明道。古人云:“千金不卖道。”古代的老师不用学问谋利,如遇清寒而又真心向道的学生,不仅不收供奉,还要补贴学生。正是为师者“谋道不谋食”的品质,深受社会尊重。

在中国古代,对师道的尊重是通过礼加以保证。《礼记·曲礼》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在二十岁行加冠礼,表示成年。从称谓方面讲,此时亲友会赠予一字,自此以后,亲友都要称其字表示尊重。即便入朝为官,天子也要称其字而不称名。可以一生称名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生养自己生命的父母,二是培养自己慧命的老师。可见古人对于老师是何等尊重。

古人入私塾读书,要先行拜师礼。而行礼者不仅是学生,连学生的父母都要向老师行跪拜礼:父亲带领学生,先向“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神位”行最重礼,之后老师入座于夫子牌位前,接受学生二人的最敬礼。如果一个家族请老师教育子弟,就由家中最尊长者代表族人向老师行最重礼。中国古代家道严谨,长幼尊卑秩序分明。试想,身为一家之尊的家长是怀着何等恭敬之心,才会向老师行如此大礼?而这种仪式,又会在孩子的心中烙下怎样深刻的“尊师重道”之印记?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谓人师,乃德行才识皆卓越者,可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必在朝在位。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但是真正的人师却如凤如麟。因为他们无论在诚意正心的修养上,还是在平治天下的智慧上,都堪为学人表率,足为后世取法。正是他们表里如一地为人演说圣贤之道,才令无数人重拾对圣贤教诲的信心,使中华传统圣贤文化薪火不灭、代代传承!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贤之道有赖于行道之师而光大。孟子尊孔子,“虽未得为孔子之徒也”,却“私淑诸人”以求其教诲,学为“亚圣”而超于孔子门生。其原因只为了“至诚”二字。所谓“至诚如神”,唯有至诚之心,才能感通天地之道,感通夫子之教。可见,对老师的尊重既是对圣贤之道的尊重,更是传承圣贤学问所必需。

尊师与治国

《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道,就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吕氏春秋》)

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在他做皇帝后,仍以学生身份自居。汉明帝造访太常府时,以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几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起向桓荣行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带头听受老师讲学。老师每有不适,明帝就派使者去慰问,而专门负责皇帝膳食和医疗的官员都络绎不绝地去服侍桓荣。明帝还亲自到老师家询问病情,进入老师所居住的街巷就下车步行,手捧经书走到老师跟前,轻抚老师,垂泪哭泣。他还送老师床具、衣物等用品,让老师更舒适地休养,久久不忍离去。从此以后,文武官员来探病,再不敢到门口才下车,而且都在桓荣床前下拜。桓荣去世,汉明帝亲自改换丧服送葬,并把老师安葬在尊贵的位置。

而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子、诸王们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于慈禧太后,与圣教的废弛、对师道的轻忽不无关系。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悬于天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这说明,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记载,孔子“养徒三千人,皆人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

尊师与平天下

“非圣人者无法”,由于东西方疏离了圣贤教育,结果,人们抛弃了伦理道德的标准,变得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盛行,贪婪、傲慢、嫉妒、怀疑等负面思想蚕食着人之本性,致使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整个人类都处在巨大威胁之下而惶惶不安。

人类如何在未来世界中生存和延续?这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义忠恕。而传统文化必须靠师道的恢复,才能传承并发扬光大。如今,愈来愈多的志士仁人达成共识,“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人类要想延续,就必须对自以为是、恣意妄为的价值观痛加反思,并重振师道尊严,以谦卑的心态仰承古圣先贤的智慧,如此方可真正实现二十一世纪的和平与发展。

师道,背后承载的是千年万世的圣贤智慧。尊师,就是尊重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唯有尊师重道,才能开启自性明德,把扭曲的人性导归正途,才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化解当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把世界带向一个安定和平的未来。重振师道,无疑乃当今之要务;师道之隆,必然为天下之福祉。

(来源:《学习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决定性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立足点——意识到必须把现代化这一普遍的任务同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当这样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实践全面展

开之时,在此实践基础上的上层领域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亦即在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的同时,构建起独立自主的学术、思想、理论、文艺,等等。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中,植根于一种本身是独立自主的历史性实践之中。

(来源:《光明日报》)

敦煌考古成就与展望

从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以来,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程。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与新材料的发现紧密联系,与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物息息相关。姑且不说藏经洞的惊天发现;不说具备现代考古学知识的斯坦因、希和尔、奥登堡、华尔纳等外国探险家对莫高窟、榆林窟和汉长城、烽燧等遗址的考察记录、照相和测绘;不说20世纪40年代向达、夏鼐、阎文儒、劳干、石璋如、张大千、谢稚柳、王子云、常书鸿、史岩、李浴等中国学者对敦煌地区

的石窟、古墓葬、阳关、玉门关等遗址的实地调查和记录;也不说1944年在莫高窟中寺后园土遗址内发现的近万件古代文书,单只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敦煌地区的各种考古新发现,就改变了许多旧有的认识,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

跑好育人“接力赛”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要创新课程内容,构建链条式课程内容体系;加强

队伍建设,形成大中小学思政教师教育发展共同体,在团结协作中跑好育人“接力赛”;夯实制度基础,构建协同化长效保障机制;优化教育环境,构建立体化协同育人格局,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来源:《人民日报》)

大力发展数字文化消费

目前,我国数字文化供给显著增长,但与庞大的消费需求相比,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还比较稀缺,难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增加高质量数字文化供给,需要秉持“内容为王”理念,加强数字文化内容建设,进一步丰富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要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运用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进行全链条、

全环节、全流程改造升级,让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数字技术“活起来”“动起来”,将其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内容与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形式新手段有机结合,打造全新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坚持市场需求导向,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在数字文化消费方面的需求,不断提高各类用户数字文化消费的满意度。(来源:《人民日报》)